

2401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贵州

论文集

210

贵州近现代史研究文集
第十集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贵州

论 文 集

《贵州近现代史研究文集》之十

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 编

2001年6月·贵阳

《贵州近现代史研究文集》

主 编： 顾大全

副 主 编： 尹克恂 何静梧

沈德海

编 辑： 朱崇演 李守明

张建军 李人选

本辑责编： 朱崇演 李人选

目 录

贺信	吴雁南(1)
研究历史 深化对省情的认识	
——“民九”前后的贵州学术讨论会综述	
.....	何 涛(2)
贵州军阀统治形态走向成熟的三部曲	
——“民八事变”、“民九事变”、“五旅纷争”和	
“定黔的宏观审视”	熊宗仁(5)
浅议 20 世纪 20 年代的贵州社会	朱崇寅(35)
试析五四前后贵州变革思想	林建曾(52)
民国初期贵州的银行与货币	钱存浩(66)
二十年代贵州教育略述	查继堃(78)
“民九事变”与刘显世统治贵州的终结	
.....	周松柏(90)
贵州“民九事变”前后的军政	
.....	沈 平 沈德海(97)
从北门桥“宰人”看旧贵州	李兆杰(111)
编 后	(117)

贺 信

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
“民九”前后的贵州学术讨论会：

现代贵州是其经济、社会经历巨大变化的时代。研究现代贵州的经济、社会状况，总结历史经验，为西部大开发，富民兴黔，提供历史借鉴，谋求 21 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贡献，已成为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大会研讨“民九”前后贵州经济、社会状况，总结历史经验，率先迈出了非常可贵和可喜的一步，在贵州社科研究领域将具有很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我同贵州师范大学文化研究室的师生，特向大会表示衷心的祝贺，并祝大会圆满成功！

吴雁南

2000 年 11 月 15 日

研究历史 深化对省情的认识

——“民九”前后的贵州学术讨论会综述

何 涛

11月15日,虽是初冬,却因连日阴雨带来寒意,但在贵州师大学术交流中心三楼会议室里却笼罩着阵阵暖流。人们为贵州社会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欢欣,为面临西部大开发的大好机遇而鼓舞。40多位近现代史专家学者和市政协委员为贵州的发展思索着,谋划着。

再过一个多月,人类就要进入21世纪,我国将要按照小平同志规划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迈步,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这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对“民九”前后即20世纪20年代的贵州经济社会状况作一个回顾,以便深化对贵州省情的认识,借鉴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轨迹中寻找智慧和力量,将有助于在新世纪迈出更坚实的步伐。这是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也是学习贯彻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精神的具体行动。为此,史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作了认真准备,并一早就聚集在会场。

《“民九”前后的贵州》学术讨论会,是由贵阳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贵州省史学会近现代史研究会

和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联合召开的。市政协副主席、近现代史研究会和联络处顾问杜云峰副教授主持了这次会议，省史学会会长、近现代史研究会首席顾问龙志毅，省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熊宗仁研究员，近现代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廖海波、莫健，近现代史研究会顾问杜文铎教授，研究会名誉副会长钱存浩副研究员，史料学会贵州高校联络处主任倪英才副教授、副主任杨秀萍老师等贵宾光临会议指导。主办单位负责人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联络处副主任李守明，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何静梧编审、韦廉舟副研究员、沈德海教授，近现代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史料学会贵阳市会员联络处主任朱崇演副编审，以及部分市政协委员、近现代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出席了这次会议。

李兆杰、沈德海、熊宗仁、查继堃、朱崇演等专家 and 实际工作者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论文，林建曾研究员，周松柏副教授、张才良副教授等准备了论文作为书面发言。发言的同志分别从 20 世纪 20 年代贵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教育以及社会思潮、社会生活等多方面，评论了当时的情况。专家们认为，由于军阀统治和混战，连续发生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滞后和受传统思想的束缚，贵州社会进步比先进地区晚了半个世纪。解放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贵州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一个加快发展的基础。

前后对比，我们有理由为贵州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与会同志认为，在看到我省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承认，贵州与先进地区相比，不是处在同一起跑线上，我省近代工业、近代农业的发展比先进地区晚了半个世纪，这是客观原因和历史原因形成的。我们即不能盲目乐观，也不能消极悲观，而是要知难而进，迎头赶上。这就需要全省上下，团结一致，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扎扎实实地打好基础。基础牢固后，才会有更快的发展速度。

与会人员还认为贵州并非一切都落后，贵州在反帝爱国上并不落后于人，而是有居于全国先进行列的多次表现。贵州并不是没有人才，20年代从贵州出去的一些人，都有过不俗表现，特别是在革命阵营中的邓恩铭、王若飞、周逸群、旷继勋、周达文、杨至成等先辈，对中国革命作出过重大贡献。因此，贵州人民要克服自卑心理，振奋精神，在革命前辈的精神鼓舞下，去创造新的辉煌。我省著名史学家、原贵州师大校长吴雁南教授为这次学术讨论会发来了贺信，指出大会研讨“民九”前后贵州经济、社会状况，总结历史经验，率先迈出了非常可贵和可喜的一步，在贵州社科研究领域将具有很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贺信全文另发）省、市新闻单位均派有记者采访，作了及时报道。

据悉，这次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将要结集出版。

贵州军阀统治形态走向成熟的三部曲

——“民八事变”、“民九事变”、“五旅纷争” 和“定黔”的宏观审视

熊宗仁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方法，一方面是考虑具体时间、具体环境的历史过程的客观内容，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加以考察；另一方面是考虑事物之间的各种联系，即事物内部的联系、事物之间的联系和事物与外部环境的联系，把问题放到彼此或互为因果，或相互影响的历史进程中去加以分析。这样，任何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处于历史进程的系统之中，被固结在历史发展的链结之上，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研究距今 80 年前后发生在贵州的“民八事变”、“民九事变”、“五旅纷争”和袁祖铭“定黔”这一系列表现为兴义系军阀内部权力纷争的事件时，才不至于被破碎繁琐的史实、五光十色的表象和扑朔迷离的情节所蒙蔽，也不会仅仅把它们归结为某些个别历史人物的个人行为，而是较好地把握其主流和本质，将真象从历史的迷雾和岁月的尘埃中分离出来，“还原”般地显现给后人。

争权夺利是军阀统治的题中应有之义，“民八事变”是贵州军阀权力斗争的必然产物，自护国运动起，在反袁还是拥袁的问题上，军阀内部就初步形成了王文华集团与刘显世集团的对立。此后王文华成了黔军总司令，刘显世当上督军兼省长。争夺随权而来，矛盾与时日俱增，终于造成刘、王两派的尖锐对立。刘显世及其手下的财政厅长张协陆、政务厅长陈廷策、秘书长兼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熊范舆、耆老会头目郭重光等人，“眼光短浅，徒自为其身家之计，因循苟且”^①，把统治贵州视为清末“兴义团务之放大”^②，因而被称为“旧派”；而以王文华为首，包括其胞兄黔中道尹王伯群及黔军主要将领的一派，“自命维新，凡以德谟克拉西为口头禅”^③，因而被称为“新派”。军阀割据时代，有兵则有权。“新派”因手执兵柄而崛起，进而要求在民政、财政方面控制全省，激烈的争夺便不可避免。

五四运动前夕，“新派”以其敏锐的嗅觉和善变的伎俩，适时地利用贵州人民要求改变现状的潮流去向“旧派”夺权。王文华宣称：“所谓立国方针者，愚意以为不外顺乎世界潮流。以经济的政策振兴农工商业，则取法美利坚，以实业立国是也”。^④“新派”控制的少年贵州会更标榜要用“德谟克拉西”反对中国的“政治

恶劣、社会黑暗、思想固蔽”^⑤。这些主张，以及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对学生运动所表现的一定程度的支持，客观上有利于贵州的新文化运动和学生运动，也为他们赢得一部分群众。“新派”乘“实业救国”的时尚，要打破“旧派”对贵州经济的一统天下，于是发生了“渝柳铁路借款案”。

“渝柳铁路借款案”是“民八事变”的导火线和重要内容。

1919年，王伯群受委为南方议和代表和贵州全权代表。他在广州和上海期间，结识了华侨实业公司主任赵士觐。此人曾为孙中山筹过款。桂系军阀控制广州军政府后，又被岑春煊派为华侨宣慰使，到海外筹款。所谓华侨实业公司，实际以外国资本为后台，在加拿大渥太华设总公司，在广州等地设有分公司。王伯群利用贵州人民痛感交通不便，商旅阻滞，实业难兴，亟配改善的心理，欲借外资修筑铁路，开发实业，作为左右贵州财政的起点。刘显世亦认为“非从筑路着手，恐将断绝生机”^⑥，丧失在军阀角逐中的竞争力，也支持王伯群。3月30日，王伯群在上海与赵士觐签订了由华侨实业公司承筑渝柳铁路（由重庆经贵阳至柳州）的草约，同时又以“振兴实业，开辟交通及办理善后”^⑦为词，签署了向该公司借款的草约，作为路约的附件。

两份草约规定了许多掠夺性的苛刻条件，处处充

满了半殖民地的色彩,但大抵是当时国内的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同类条约的翻版。刘显世既同意于先,贵州认可这样的条约原本没有问题。省议会曾几次开会讨论,仅少数人认为草约条款含糊,易为外资提供侵害贵州主权的口实,不予通过。张协陆、陈廷策等人恐此路一成,王伯群将成为首功之人,私下密谋反对。刘显世认为修铁路“于主权并无妨碍,此路若成,贵州可以开发”^⑥故极力维持。一些人对筑路一约虽有意见,但认为略加修改尚可考虑,但讨论到借款一约时,张协陆等人抓住王文华提出要由500万美金的借款中先提取100万偿还黔军历年欠饷,又主张“拉本作利”的偿还方式作把柄,群起发难,否认借款,进一步推翻筑路草约。

王文华提出的所谓欠饷问题,实为子虚乌有。黔军主力就食川、湘,人所共知。提取借款显系军事头目们又想中饱私囊。张协陆上书刘显世反对借款,拟定意见书广为散发,抢先控制舆论。意见书内容大致如下:一、借款事前未定用途、年息高,将累及人民;二、反对拉本作利;三、一时无正当用途,可只借华洋2000万元,年息由财政厅筹措;四、请各方监督,绝对不准挪用^⑦。仅意见书的字面条款,条条在理,自然无可非议,但其背景和真实用意,纯为两派的争权夺利,与人民群众反对军阀卖国的斗争风马牛不相及。意见书的广为散发,迅速在省内外掀起了一场反对王

文华兄弟卖省营私的轩然大波。在一片反对声浪中，原先赞同借款的刘显世和熊范舆也党同伐异，转而反对。旅外黔籍人士，一则不明真相，偏听偏信；二则早存派系之见，右袒一方，因而也分为两派。双方借省内外报纸，推波助澜。川、桂军阀皆以贵州擅自订约，有犯“省权”，久议不决。四川最后回电，认为应“三省各派代表协商订约，自为分担责任，划明权限”^⑩，事实上否定了贵州订约的资格。吵嚷半年之久，草约遂成废纸。“新派”将全部怨愤发泄到陈廷策、张协陆、熊范舆等人身上，以“少数奸人，徒逞私见，罔顾公益，函电纷投，力求破坏”^⑪为词，胁迫刘显世“从严查办”。王文华还以辞职相要挟。两派剑拔弩张，必要决一雌雄。

“渝柳铁路借款案”发生的同时，贵州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旧派”反对学生运动。“新派”则基于西南军阀的立场反对北洋政府，并发表演说、通电，支持学生运动。在全省性的抵制日货高潮中，亦起了一定积极作用。似乎形成了“新派”与学生运动的某些一致性。其实，因为贵阳的大商家，几乎都与“旧派”有某种联系，反对这些商家贩卖日货，亦达到削弱“旧派”势力的作用。“新派”因势利导，把群众斗争的锋芒，引向“旧派”身上。

由于兴义系军阀的横征暴敛，加以1918年以来旱、涝、虫、雹灾害轮番肆虐，造成不少地方颗粒无收，

百物昂贵，流民乞丐充斥城镇。群众中充满了对官僚军阀的仇恨。兴义系军阀盘剥人民，“新派”无不从中分润，自然洞悉其中隐情。但他们完全委过于执掌财权的张协陆等人，稍加揭露，大肆渲染，致使民怨沸腾。张协陆主持财政厅以来，“自民四以后，即未办理决算”。^②许多入款均无下落，从1915年至1918年8月，刘显世“旧派”集团共贪污公款180多万元，查无实据者尚不在内。“凭之文电，考之档册，证据显然”^③身为财政厅长的张协陆难辞其咎。省议会连篇累牍向张提出质询，王文华等人还假《勤报》刊登广告，扬言将连载《贵州财政厅黑幕大观》。“新派”大造舆论，认为贵州物价暴涨，捐税苛重，民不聊生，皆因为省长的昏聩^④，长财厅的腐败，司政务的黑暗，管银行的狡诈，主议会的不顾民意，把罪过推得一干二净。一时间，人言汹汹，火力全喷向“旧派”。“新派”还发动数百名黔军伤兵集体到财政厅索要欠饷和恤金。伤兵们三五成群，手持棍棒到张协陆私邸寻衅滋事。张协陆心虚，提出辞职，未获批准。“新派”还利用风靡一时的“军民分治”之说，乘省议会议长张彭年提出辞职之机，由倾向自己的副议长张士仁及几个常驻议员主持开会，推举王伯群为贵州民选省长，并电请广东军政府任命。时值省教育会会长任满改选，王文华支持彭象贤竞选，致使原会长张彭年落选。“新派”夺权的势头越来越明显了。

贵州的一系列冲突，引起川、滇、湘、桂等省军阀的侧目，外省报纸谣传纷纭。“旧派”企图以隐忍退让求得缓和，“新派”却寸步不让，暗中组织“平民大会”，扬言将公审张协陆、熊范舆；外间还风传“新派”已成立了暗杀团，专一对付反对借款诸人。一时风声鹤唳，四面楚歌。

11月26日夜，陈廷策被人开枪行刺受伤。“新派”自然否认是自己所为。但英国在上海办的《字林西报》驻贵阳记者却称：“此一惨剧，似与政团有所关系”^④，两天后，省议会“因审议历年决议案，出处不合，为数甚巨”，提出查办财政厅长案。12月1日，刘显世迫于压力，舍车保帅，咨复省议会“从严查办”^⑤。张协陆走投无路，次日服毒自杀。“新派”为澄清事实，推卸“逼死人命”之责，公布张协陆“侵越行政长官之权限”、“妨害民意机关之职权”，“破例敛财危害政治”，“隐匿收入公帑”，“用人不依正规”，“纵容属员舞弊”，“估占平民产业”，“勒军饷不发”^⑥等等事实。其实虽有夸大不实之处，但大抵是财政厅黑幕的透视，使“旧派”处境更窘迫。

张协陆之死，是“民八事变”的高潮，但远不是两派斗争的结束。张协陆自杀前后，“旧派”已濒临秋风零落之势。张彭年逃亡上海，警察厅长李映雪受弹劾而下台，由“新派”的李雁宾暂代。陈廷策闭门养伤，由周鸿宾代理其职。财政厅长则由王文华的妻兄段

家榕接替。鉴于省议会已推王伯群为省长，刘显世只得应允南北统一后让王文华督黔、王伯群长黔，以作缓兵之计。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贵州“民八事变”。

二

“民八事变”前后，王文华、王伯群弟兄利用喧腾全国的“军民分治”风潮，发起并操纵贵州政治委员会，以“刷新政治”为宗旨，作为“全省政府之枢纽”^①，“审议贵州政治上一切应兴应革事宜”^②。为了掩人耳目，“新派”推举德高望重的“旧派”人物任可澄为会长，让其充当接管省政的过渡。之后，“新派”又得寸进尺，胁迫刘显世让督军或省长一席，并以“废督留省，废道设厅”达其改组省政的目的。刘显世对此的表示是：“废督就是逼我死！”然而，潮流毕竟是不可抗拒的。继唐继尧宣布自废滇督以后，刘显世也于1920年6月27日宣布自废黔督，暂以川滇黔三省联军副总司令名义收束军队。督军名义虽不存在，但刘显世仍以三省联军副总司令名义掌握着贵州军阀的命根黔军。

“新派”的迅速得势和“旧派”势力的陡然跌落，在西南军阀营垒中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四川军阀熊克武派驻广州的南北和议代表刘亚休在致熊克武的密电中指出：“刘王两派内讧已烈，闻将以电轮督黔，伯群长

黔，统一后便可成事实”。刘显世也预感到大势不好，密电岑春煊“已允统一后正式与伯群长黔”^①。在谋士们的怂恿下，刘显世决心作孤注一掷，倾全力实现倒王的目的。当时，正值川军联合起来驱逐滇、黔军。黔军在四川已处于被动挨打地位。在刘显世的支持下，黔军中出现了薛尚铭为总司令的反王文华的秘密组织——“靖难军”。薛尚铭曾在熊其勋混成旅任团的副官，成都巷战时得以幸免，与反王拥刘的袁祖铭关系密切。“靖难军”设司令部于四川安岳，发表宣言：反对王文华，拥护刘显世，与四川各军恢复亲善，号召黔军官兵脱离王氏体系^②。在“靖难军”的文告和传单中，历数王文华对刘氏兄弟忘恩负义，贪功利己，排除异己，滥杀部将，私吞公款，大修公馆，广置姬妾，操纵议会，图谋省政，逼死人命，祸害四川等等。以上所列，有的确系事实，有的颠倒黑白，有的是为“旧派”和公开降附北洋军阀的人张目，薛尚铭还故布疑阵，宣称黔省“驻川军队共有十余营，在石牛栏一带有义军约有两营，已经约好共同组织靖难军，征讨王文华，拥戴刘督军”^③。这些宣传，一定程度上离间了黔军的内部团结，网罗了更多反对王文华的人。

由于护国战争后一直驻扎湘西的卢焘混成旅被王文华调到四川施行集团训练，湘西黔东遂成游击军王华裔部的天下。王华裔自称清乡司令，公开打出反对王文华的旗号，为了造成内外夹攻之势，“旧派”不